

首页 → 研究方阵 → 藏族文学 → 当代文学

听阿来讲那藏族小村的故事

——评阿来的长篇小说《空山（2）》

发布日期：2007-02-22 作者：付艳霞

【打印文章】

人类生活的永恒矛盾之一，是生活于此而向往彼岸。“彼岸”因而不断被未竟的梦想修改，由名词而变为形容词。西藏、藏族人的生活，对于从未在此生活过的人而言就是“彼岸”，而对于阿来，西藏是“此在”。因而阿来书写藏地故事，与读者阅读阿来的小说，构成了一个彼此向往和彼此修正的双向互动。阿来写作的价值也由此确立。

曾经，我们从阿来那里看到的西藏，是尘埃骤然泛起与宛然落定，那里有土司的院子、安静的雪、清脆的画眉、幽灵般的行刑人，还有直白的情欲、喧嚣的部落征伐；如今，它变成了一个小村的故事，变成了像风一样随风飘散的忧郁少年格拉，像英雄一样在烈火中死去的巫师多吉，像哲学家一样皱眉思考的树居怪人达瑟，像猎人追逐猎物一样追逐爱情的达戈，像难逃宿命一样被土地魅惑的红军驮子……

阿来写到的每一个机村人，都生活在像什么与不像什么之间，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因为，机村的传统根基、炊烟袅袅的生活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打破了，往日不可追，未来走向不明晰。困惑与求解成了阿来笔下机村的画像。人心变得浑浊，难以判断利弊得失。如果说，《尘埃落定》是阿来对于土司时代的一曲挽歌，那么《空山》的思考对象则是农耕文明的消逝，这个早已开始而远未结束的过程改变了什么，为这改变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。人的代价，是让阿来萦怀不已的问题，所以，他不惜用片断化的写法，来增加被纳入镜头的人的数量，由数量来拓宽机村映照历史和现实的限度。

《空山（2）》的第一个故事《达瑟与达戈》，主角是读书人达瑟和达戈。两个人物一个走出机村，一个走进机村，一文一武、一静一动，与金嗓子美女色嫫一起，构建了机村一角的生机勃勃。诗意的爱情，血腥的捕猎，机村内部的疑难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诱惑，都是故事的题中之意。第二个故事《荒芜》以红军驮子一生对土地的追逐和向往为线索，讲述机村寻找传统根基和生存空间的努力。诗意的探险、浪漫的怀想、残酷的政治斗争，都是小说的外在形态，而机村生活的物质根基——土地与粮食，在这样的故事中不断凸显。这是机村与任何中国小村了无差别的地方：绿色家园永久丧失，荒芜瞬间来临，猝不及防的改变，对于老百姓而言，事关生存，与此无关的任何东西都变得轻飘，变成了被华丽谎言遮掩的血色浪漫。

阿来说自己一直在路上，在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化间流浪，如今，他流浪的脚步也开始慢慢跨越国界了。此时的阿来反而不断地反观来路，思考本源。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，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弥合着所有的差别，如同福柯发现的真理一样，连毛细血管都不被放过。在由来已久又显而易见的差别面前，反而是历史和文化的同构，变成了崭新发现。关于藏地生活，人们想当然的文化想象全部落空，阿来提出了一个更有价值的话题：所有人，所有传统文化常识的总和都无力构建的西藏，被什么力量缔造和实现？人，无论是置身西藏的人，还是想象西藏的人，在这蛮勇的力量面前都变成了羔羊。这才是更大的落空，阿来就是要用牧歌的方式揭穿一个坚硬的现实：在意识形态的力量面前，没有幸存者。西藏的底里与我们生活的地方毫无二致，而所有的想象只是它的表象，它的空壳。“空山”由此变得意蕴丰富，虚实难辨。

阿来在尝试一种新的小说结构。表面上看，《空山》系列要用若干个中篇作为花瓣，成就机村的现代变迁这个花蕊。实际上，如果抛开小说的外在格局，可以看到阿来在尝试一种“道路小说”的模式——情节彼此不甚关联，而时间段和主题却又一致。这种模式有些类似于米兰·昆德拉在《笑忘录》中提到的“变奏形式”的小说。小说的叙事从来不是延伸到结局的直线公路，而只是交叉的山间小径，没有可以让人一眼看穿的目的，小说的想象在布满灌木和草丛的森林中自由流浪，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，组成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，这视野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“道生万物”：因其空而万物尽纳其中。

“空山”由此沾染了哲学意蕴的开阔和现实判断的无力——阿来追问意识形态下的藏地小村和米兰·昆德拉追问意识形态下的自

